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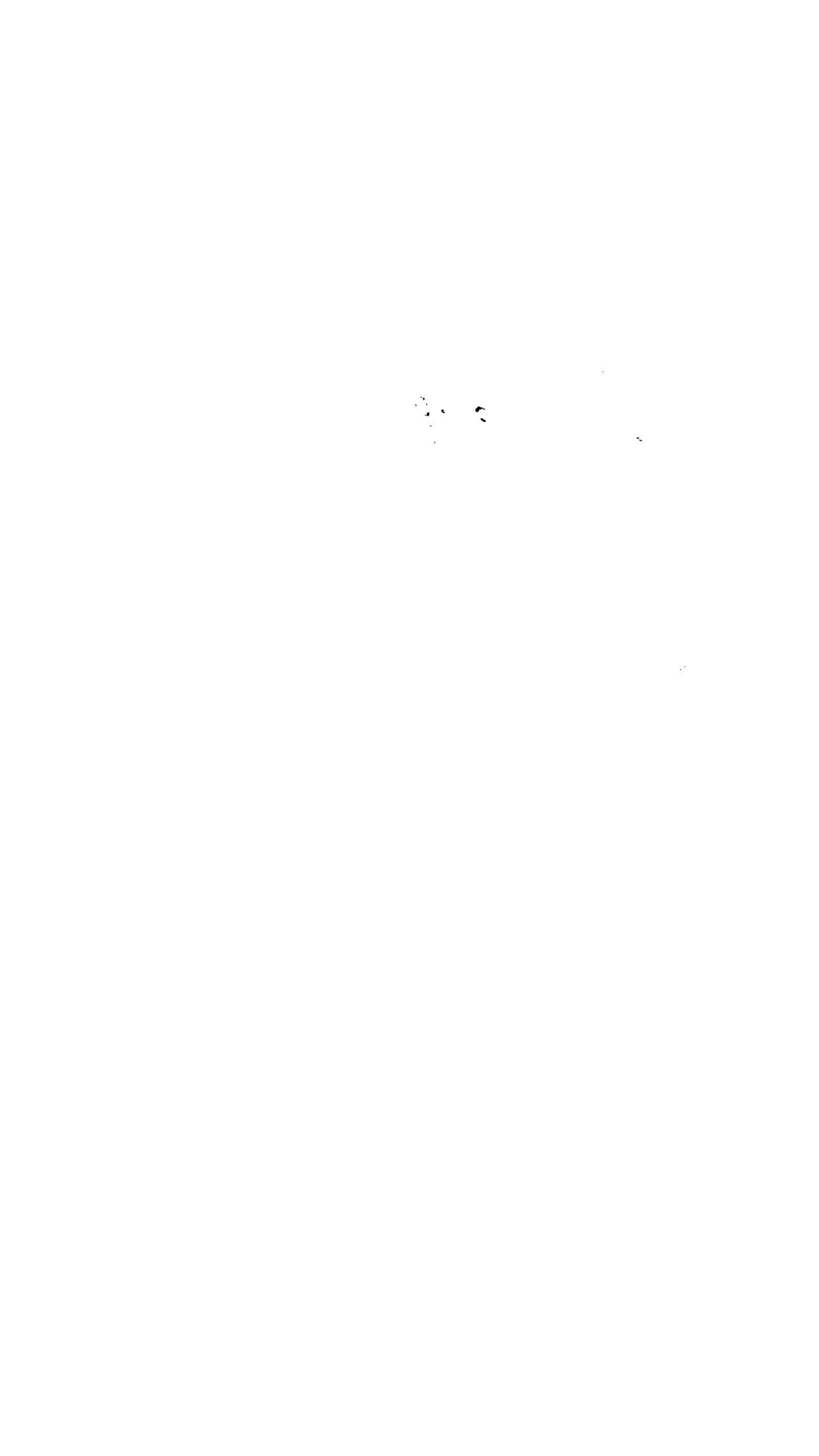
書叢小科百代時

年十埃維勦

著民斐吳



行發局書社時海上



目 次

一 歷史的迷惑	一
二 大革命失敗後的客觀形勢	四
三 武漢政府時期的革命路線	八
四 機會主義者的錯誤	一一
五 關於土地革命	一八
六 革命走向蘇維埃階段	二二
七 南昌八·一起義的意義	二九
八 兩湖秋收起義及其影響	三三

九	廣州公社的經過……	三七
十	革命勢力的勝利發展……	四四
十一	粉碎三次「圍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四七
十二	「九一八」後的中共抗日行動……	五一
十三	粉碎五次「圍剿」·準備北上抗日……	五四
十四	二萬五千里長征……	五九
十五	「八·一宣言」號召的影響……	六一
十六	堅持民族抗日統一戰線……	六六
十七	西安事變……	七一
十八	五項要求四項保證……	八〇
十九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	八四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故人不以爲子也。故曰：「子」者，子孫也。

我們相信對於這些問題，一定有許多人是抱着迷惑的；假使僅從歷史的現象上來看這些問題，的確無法解除這種迷惑。不過，歷史的現象，不一定就是歷史的本質；尤其如果將歷史的現象加以個別的、孤立的觀察時，更容易使我們感到困惑不解。如果我們將十年蘇維埃革命和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當做是兩個孤立的、靜止的歷史現象加以考察，而不從辯證的、發展的、動的觀點上去分析問題，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十年蘇維埃革命在當時的歷史意義以及它與今天新民主主義革命間的一貫的史的發展關係；而不去正確理解其間的關係，我們就不能正確地把握中國革命的整個歷程；甚至因為不能正確地理解中國革命的史的發展，而會引起對革命問題的思想上的重大錯誤。所以把十年蘇維埃革命的歷史搞清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革命運動並不能看做是一個直線上昇的運動；因而由革命運動交織而成的歷史，它的發展也不是一直線的。革命有發展的步驟，歷史有發展的階段，而其間就包含着許多迂迴曲折的途徑；如果我們不理解某一革命階段的當時存在的歷史情況，也就無以理解革命歷史的進程。譬如說，我們知道今天的歷史的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今天所有世界革命運動的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但從橫的關係來看，就各個革命政權的現象來看，則不僅形式各異，而且在各自革命階段中的質的內容，也各各有異。像蘇聯已經在實行社會主義了，它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蘇維埃專政；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則已臨近了社會主義的門戶；而中國則猶須貫澈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原則是不變的，但活的馬列主義的任務却是：必須依照新的情況和新的經驗去推動這

一原則；因此，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革命的形式與革命任務的不同性質。

二 大革命失敗後的客觀形勢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以第一次國共合作方式進行的大革命中，主要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在中國一天沒有完全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包括軍閥、官僚等各種腐化勢力）的鎊銬，獲得民族解放之前，這一革命的大目標是不變的。那怕在國民黨的反動派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實行了叛變革命以後，這個基本任務也依舊沒有變化。因為「四一二」的叛變祇是表示了中國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出賣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帝國主義者，而並不是表現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業已成功，更談不到是民族已獲解放。相反，正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和資

產階級的中途叛變革命，一方面打擊了革命，同時却更加重了參加這第一次聯合戰線的其他革命份子的責任；尤其是加重了始終堅持這一革命的工農階級的責任。國民黨反動派在實行「四一二」叛變之後，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領導權，毫無疑問地落在中國工農階級的身上了。

但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是否直接發生於「四一二」叛變之後呢？不是的。當時的托洛斯基派倒確曾有過這樣的主張，中國的托洛斯基派可以說一開始就是反對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國民黨的聯合戰線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他們老早就將國際帝國主義集團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看做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很「左」地喊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在「四一二」叛變之後，他們更振振有辭地提出了立即在中國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主張。但中國的十年蘇維埃運動却絕不是這種主張下的產物，而是隨

着後來的客觀革命形勢所決定的另一個革命的步驟。

在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四一二」叛變前後的政治形勢是這樣的，即在新軍閥蔣介石一系領導下的國民黨，雖然已在南京上海勾結了帝國主義，開始背叛革命；但當時政治中心地的武漢，革命情緒還是相當高漲的，特別是兩湖（湖北、湖南）各地的工農鬥爭和組織運動，進行得非常熱烈而廣泛。例如一九二六年底，在武漢總工會之下南會員擴大到卅萬人，工會擴大到二百個左右；湖南省的工會也由五縣增至四十縣，工會會員由六萬增加到十五萬人；農民的武裝反封建鬥爭，也進展得非常迅速。所以革命陣線中的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如果能將廣大羣衆的革命力量去推動當時的武漢政權，使武漢政府成為以工農聯盟為中心的政府，將國民黨的下層組織在新的革命羣衆基礎上重建起來；那末，當時的武漢政府，是可能

成爲工農專政的革命機關的；是可能將因國民黨反動派叛變所引起的不利於革命的形勢，重行轉變到有利地位的。

國際第八次執委會議的決議案中，曾指示當時的革命形勢說：「中國革命中巨大的困難，尤其是因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的武裝干涉或他種干涉，以及中國國內動搖的社會成份叛變革命投降敵方所生的困難，造成了目前鬥爭的條件；爲戰勝這些困難計，必須廣大勞動羣衆加入鬥爭始可。要想引導羣衆加入鬥爭，只有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在城市滿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才有可能。要堅決取消繳納富豪之佃租，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之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盤剝之債務，大減賦稅，課稅攤派富豪之家等等，這些要求必須在全國，首先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實現出來；必須拿這些口號去發動羣衆，使之反對地主及

叛變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反對北洋軍閥。……」

三 武漢政府時期的革命路線

在當時，一方面有托洛斯基派的要求在武漢政府之外立即成立工農兵蘇維埃，一方面則有機會主義者的恐懼革命「過火」；這兩種主張，竟迫使尚未叛變的武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亦行叛變。這兩種乍看來似乎是左右對立的主張，實際上同樣有害於革命。

關於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問題，就當時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工農革命運動言，確乎會使人發生「時機已成熟」的錯覺；但事實上當時的問題中心並不是在另組一個政府，而是在於怎樣運用已經發動的革命力量到既存的政府形體中去。換句話說，當時不應該因國民黨中反動派的叛變，而立即

實行退出國民黨，與國民黨有關的一切機構脫離關係，甚至放棄尚在國民黨手中的一部份羣衆而另起爐灶。問題恰是相反，當時應該做的，是將尚保持革命性格的武漢政府澈底地使之成爲一個真正有革命羣衆的革命政府。如果當時就實行組織蘇維埃政府，不啻是分散革命力量，而且會迫使革命性格較軟弱的武漢政府投向反動派。所以在這個時期，提出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口號是不適合的；這口號在字面上雖然很足吸引在遭到「四一二」叛變打擊後的一部份羣衆，然而實質上倒無寧說是幫助了反動派。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向中國勞動大學學生所作的談話中，就非常正確地指出了反對派的這種有害革命的主張；斯大林同志說：

「反對派要求立刻在中國組織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現在（一九二七年

五月）組織蘇維埃，這是甚麼意思呢？第一，不能在任何時候組織蘇維埃，組織蘇維埃只是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候；第二，組織蘇維埃不是一場空話，他成立首先就是反對現存政權的機關，是爲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機關。一九〇五年是這樣，一九一七年也是這樣。現在在武漢政府區域內組織蘇維埃，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提出組織新的政權機關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因爲現在在這些區域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政權而外，沒有其他政權。這就是說，把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農羣衆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職工總會，工廠委員會等等的任務，與成立新的國家政權形式（蘇維埃制度），來代替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任務，混淆起來了。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所處的階段。這就是說，給中國民衆的敵人以新的武器來反對革

命，來散佈謠言，說中國並不是在進行民衆革命，而是要把『莫斯科蘇維埃化』機械地搬到中國去。因此，反對派提出目前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他們自己便成了中國革命敵人的玩具。』

這是何等英明睿智的、正確的分析。帝國主義者自從在寧漢之間獲得挑撥離間的成功以後，現在就正在希望武漢政府的本身間，也因鬧兩重政權的問題而引起內部的分裂、崩潰。蘇維埃政權雖然是帝國主義者的眼中釘，然而在這個時期，武漢政權區域內而有蘇維埃政權出現，第一個表示歡迎的正就是帝國主義者，因為這樣才現現成成的做了帝國主義的玩具。

四 機會主義者的錯誤

在另一方面，在陳獨秀一派領導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却又認為當時工

農運動已經鬧得太「過火」了。他們雖然也看出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有限的，即使是武漢政府中的國民黨「左派」，也已經在動搖中；但陳獨秀這輩人的見解却很特別，他們不相信工農的革命力量可以防止武漢政府的動搖，倒反認為羣衆的革命行動已經太「過激」了，工農的革命已經走得太遠了，要不是自己退讓些，不僅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將要「跟不上」，而且有迫使他們走向反動道路上去的憂慮，因此竟喊出了「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的口號；倒好像國民黨反動派的「四一二」叛變，是被羣衆的高漲的革命情緒所迫出來的一樣。於是，在武漢政府的「左派」國民黨猶未開始動手解除工農武裝之前，機會主義者先自贊成解散工農的組織，解散勞動童子團，甚至竟自行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列寧曾說過，「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搖」，然而機會主義